海外视野

中国慕课向何处去

■郭英剑

首先，中国慕课应该面向中国，并注重打造中文慕课平台。在慕课开始发展之后，中国一些顶尖高校先后加入了美国的一些慕课高校，这值得称道，也是高等教育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交流与发展的一个体现。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中国慕课的发展应该首先为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作出贡献。慕课最重要的宗旨就是能够使所有人（凡是能够接触到互联网的人）都能够拥有教育的机会，因此，其对教育的大众化的巨大贡献不言而喻。有学者统计过，我国接受高中教育的人口比例仅有18%，而韩国为66%，美国更是高达87%；就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比例而言，中国为3.6%，韩国为23%，美国则为35%。这些数据都表明，如何让慕课面向中国并为中国服务，应该成为中国慕课最为关注的焦点，也应该成为中国慕课的使命所在。因此，打造众多使人分享优质教育资源的中文慕课平台迫在眉睫。

其次，中国慕课应该服务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无论是在哪里，要发展慕课，都必须首先回答慕课为谁而作的问题，即应该面向哪些受众的问题。我以为，第一，慕课始自高校，既应该也可以很好地为高等教育服务。慕课带给高等教育的改革，最突出地体现在“翻转课堂”上，即在线的课堂环节加上课堂内部的深入探讨和解决问题，也就是人称“混合式”的教学模式。第二，慕课可以很好地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服务。换句话说，中国慕课应该注重加强其在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未来发展。这符合中国重视基础教育的传统。基础教育领域实际上也孕育着巨大的市场与需求，只要做得好，相信未来会有大发展。华东师范大学于2013年9月组建了以研究与开发基础教育、教师教育的慕课中心，主要联合一些高等师范院校与知名的中小学开发高质量的在线课程，使之为全社会共享，以推动我国的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从他们的实验、努力与推广中，我们可以看到慕课用于基础教育的广阔前景。

再次，中国慕课应该辐射社会。慕课所具有的网络化、公开化的特征，实际上也意味着它具有强大的社会化功能。在中国，慕课辐射社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服务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由于有了慕课使他们可以在工作与生活之余，找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遇。就此而言，慕课的意义非凡。第二，为已经走出校园的毕业生创造继续教育的机会。无论毕业时间长短，作为进入社会中的人，他们同样可以通过慕课而回炉深造，从而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第三，为所有需要的人提供更加实用的知识与培训。就整个社会群体的受众而言，很多人或许需要更多的实用知识，而社会也对职业型人才有更多的需求，因此，中国慕课的发展，完全可以注重传授实用知识和打造职业培训的内容，以供社会之需。由上海高校课程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其所提供的慕课选课人中，有三分之二都不是在校学生。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社会对慕课的需求拥有潜在的市场。

> “在中国慕课发展的起始阶段，亟须回答三个问题：中国慕课应该面向哪里？为谁而做？未来发展的出路何在？为此，我提出，中国慕课应该“面向中国、服务教育、辐射社会、走向世界”。



图片来源：www.quanjing.com

最后，中国慕课走向世界，应该为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需要中国的慕课首先为中国本身作出贡献。在中国慕课走向世界之时，面临着两大问题：第一，中国慕课要加入到诸如美国的慕课平台，使用何种语言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这里的语言问题有两个层面。一是教师所使用的语言问题，即在中国的教师中，有多少人可以胜任使用当下的国际语言英语来制作和使用慕课呢？这还是个未知数，但情形并不容乐观。二是慕课课程的相关内容用何种语言表达更为有利，也同样需要仔细斟酌。我们知道，慕课的受众是世界各地的网民，但由于语言、地域和文化的差异，如果依靠翻译就极有可能造成理解上的偏差乃至误解。比如，中国古代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等极富中国特色的人文学科内容，使用汉语表达可能来得更精确。而且从现在看，中国高校所制作的慕课大多使用的是汉语。但问题是，中国的慕课若想在将来与国际名校名师的慕课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使用英语恐怕是大势所趋。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第二，中国慕课如何才能为全球的教育国际化作出独特的贡献，突破口在哪里，同样值得深入思考。依我之见，在当今科学技术全球化，中国的科学技术已经处于国际语境之中，使用的也是国际语言英语，中国的社会科学界也差不多与国际接轨了，人文学科或许是未来中国慕课能够为教育国际化作出独特贡献的突破口。但如何做出符合中国特色的慕课，又能进入国际通用语言环境之中，这可能需要假以时日方能有所进展。

慕课对世界教育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中国，要想让慕课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直面中国、服务教育、辐射社会、走向世界”应该成为未来中国慕课发展的路线图。对此，我们完全可以充满期待！

钱学森之问的海外求解

教育如何鼓励学生犯错

■卢晓东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本科教育主要由文理学院完成，在其全部27728名本科生中，有23321名本科生在文理学院，只有4407名分布于其他三个职业性学院。洛杉矶分校为了支持本科生科研活动，竟然成立了两个独立的办公室协调和组织相关的工作，分别是“本科生科研中心——自然科学领域”“本科生科研中心——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这在美国高校中也十分独特的。负责本科教育工作的院长同时兼任副教务长的是帕崔西娅·特纳（Patricia Turner）教授，她个人的学术领域是世界文化和艺术以及美国非洲人研究。在维基百科上特纳教授被定义为一个民俗学者。在洛杉矶分校工作之前，特纳教授曾经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负责本科生教育工作。

对于创造性人才培养的问题，特纳教授给出了三个回答。

第一，特纳教授认为关键在于中小学教育。人天生就有好奇心，但中小学教育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天生的好奇心，使其发展起来。

从特纳教授这一看似一般的回答里，反思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会有些收获。学生的好奇心家长和老师都知道是什么，但如何能够发展学生的好奇心呢？何种教育活动又会摧毁好奇心？比如小学奥数比赛和专门的培训，是激发学生好奇心的教育活动吗？比如高考在中小学教育中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高考如何鼓励中小学激发学生的好奇心而不是摧毁好奇心呢？

第二，特纳教授认为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和社会文化体系，应该鼓励学生犯错误并且能从错误中学习。

真正的创新活动意味着解决人类整体未知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而言，解决的方向可能是360度，其中可能只有一个方向，即1度的方向可能正确。但要找到这1度的方向非常困难，理论上犯错误是必要的。这就是在哲学层面、社会文化层面必须鼓励个人犯错误的基本原理。鼓励犯错误才能鼓励创新！当然，在创业领域道理也是一样。

在教育领域建立这样的制度和体系，困难更大一些。从这一角度反思从中小学一直到大学的考试，我们的考试评价基本逻辑是相反的，学生犯错误就会被扣分，这意味着某种处罚，所以我们教育体系最核心的逻辑就是不鼓励，而是持续处罚学生犯错误，以此帮助学生形成并强化他们“正确”的观念、方法和价值体系，让他们像惊弓之鸟一样害怕犯错误。我们的小学中，学生写字笔画超出一点就要被扣分，每次考试学生成绩不是一百，家长和学生都会收到班主任警示的短信，家长也发展成了“惊弓之鸟”。我们如果以范式描述既有知识体系的核心，我们的考试就是在强化范式陷阱，强化一种对于犯错误的恐惧心理，这是与创新截然相反的逻辑。

那么，如何鼓励学生犯错误并且能从错误中学习呢？以下改革可能是有效的方向。考试评分制度的粗略化，由百分制向A、B、C等第制过渡；奖学金制度的改革，由鼓励学生成绩精确向鼓励创新转变；考卷返还制度，给予机会让学生从错误中学习。

在教育体系中鼓励学生犯错误，意味着构建灵活的教育体系，这样的教育体系包含有多次机会，比如转学制度允许在社区学院就读的学生转学到加州大学系统，这种制度给予学生新的学习机会，同样成为其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依据1959年的《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加州大学系统招收非常大量的转学学生，例如2012~2013学年，洛杉矶分校录取了一年级新生5621人，录取了转学学生3172人，这样的本科教育情况就是一、二年级5600多人，三、四年级则有约8800人，学校需要开设更多的三、四年级专业课程，或者在三、四年级有更大的班级规模。

第三，特纳教授认为在大学的考试中，50%应该考查学生是否掌握了既有知识体系的事实、理论和方法；50%的应该鼓励学生创造性思考和表达。

如果将50%的比例分配理解在考试的内容层面，意味着50%的考试内容应该考查学生对既有知识的掌握；另外的50%内容应该有一定的开放性，或者一定未知程度。能够设计出这样的考题，要求教师本身积极参与科研工作，本身就在学术前沿。如果将50%的比例分配理解在评分的标准，那么掌握了目前既有的知识只能获得基本及格成绩，而取得高分必须具有创造性思考的表达，这样的要求似乎有些太高了。

学生选择与新人才培养机制

■方志梅

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学生的成才、发展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如何适应学生和社会的发展需要，是当今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必须解决的问题。

2006年，宁波大学在多年的“平台+模块”课程结构体系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基础上，提出了“把成才的选择权交给学生”的教育理念，以学生选择专业为切入点，以扩大学生对教学资源的自主选择权为突破口，在全校范围内实施大类培养，将竞争机制引入高校。

为此，学校在2008年1月成立了阳明学院，专门负责全校按大类培养的大一学生的教育教学管理。阳明学院在师生构成和工作职能上有别于专业学院，也不同于学校职能部门，其运行模式在国内没有完全可以借鉴的经验。六年来学院以学生为中心，对人才培养机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实践。

重构培养流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基础融通、学科相近为原则，组建跨学科门类、跨学院的学科大类，将现有70多个本科专业划分为经济与管理类、法政文史类、自然科学类、工程技术类、生物与化学等13个学科大类，并按照基础性、交叉性的原则，设置学科大类课程。

学生实行按学科大类招生，一年级在阳明学院进行大类培养，学习大类课程和部分通识教育课程，经过一年成才规划、学习方法的指导，第一学年末自主专业选择，之后在专业学院继续学习，完成本科学业。这种模式打破了传统的专业学院一贯培养的流程，使学生有时间充分认识专业、分析自我、了解社会需求。

健全自主选择机制，培养学生选择能力。研究制定专业分流计划，建立专业分流机制，使学生入学一年后可以在学科大类内自主选择专业，这五年专业分流的第一志愿满足率达92%。同时，完善学生的选课、选教师机制，尤其是对量大面广的大学英语、高等数学系列课程推行试听选课制，允许学生重新选择任课教师。通过建立健全学生对教学要素的选择机制，使学生具有学科大类、专业、课程、教师的选择权，促进学生的学习和个性化发展。

建立全员育人机制，探索教育教学开放管理。阳明学院只有管理教师没有专任教师，只有大一学生没有高年级学长，据此，建立由开课学院选派任课教师、负责课程管理的教学借力机制，每学年全校17个学院的500多名教师承担阳明学生的教学。建立导师借力机制，每学年在全校聘请6~7位教授担任全院学生的专任导师，在各学院聘请70多位教师担任班导师进行指导教育。建立学长借力机制，在全校选拔优秀学长担任辅导员助理和学生干部骨干，建立一班一助理、学生组织以老带新的传帮带体系。通过这些师生借力机制的实践，集全校之力实施大类培养。

建立学习指导机制，促进学生学业发展。大类培养又使学生面临专业等各种选择，为此学校开展了多层次、多方位的学习指导。

首先是专业选择与成才规划指导。开展专业展示活动，以专业介绍展板、专业讲坛、专业实验室开放、专业现场咨询以及学科导论课程、大类课程教学等形式，多角度介绍专业，指导学生选择专业。同时，邀请校内外名家名师举行阳明系列讲座，拓宽学术视野，指导学业规划和职业生涯规划。

开展多层次的学习与科研指导。由专任导师开设导师门诊、举行讲座沙龙，指导学生学习方法。由班导师通过主题班会和约谈交流，引导学生调整学习状态、适应自主学习，指导科研活动。由优秀学长以访谈、咨询的形式，交流学习与科研心得。开展科研训练营、院级学生科研资助和学科竞赛等活动，进行学生科研孵化，增强学生的科研创新意识。

形成工作协调机制，理顺大类培养管理体系。大类培养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教学管理体制，为此制定并完善了专业选择、学习指导、学生管理等各类规章制度，确保大类培养有章可循，有制必依。成立阳明学院工作协调委员会、充分发挥教务处和学生处的协调作用，密切与各学院的沟通联系，改革开课计划制定程序，改进选课管理、考务管理和教学档案管理，协调任课教师、班导师、专任导师的选派，形成大类培养的运行体系。

（作者系宁波大学阳明学院院长）



域外传真

大学建立海外分校仍有必要

■克里斯汀·恩纽

学生总是在不停地寻找最佳的学习机会，而研究学者们也总是在跨领域开展合作。直到最近，不管有没有受到潜在目的国的保护性措施的限制，高等教育机构都还是顽固地局限于一国之域。但是过去二十年来，无论是人们的态度还是行为，环境、政策和限制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近日，一份英国文化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英国大学在印度之机会的报告，点出了印度高等教育办公室关于更多研究合作的需求。而这些，是在国际合作使得学位项目在数量上有了大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正如新数据所表明的那样，大量海外人士攻读英国学位，且呈增长趋势。

诺丁汉大学在2000年开办了马来西亚分校。据估算，全球有少于5%的学生会远赴海外受教育，这一数据并没有像想象中疯狂。在国际上建立起一个教育实体（即开办海外分校）相当于为职员和学生都提供了来到英国的机会——可能本不会来或者来不了。如果大学还想要继续吸引高质量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话，就应该革新。

马来西亚的学生自从上世纪40年代起就持续不断地在诺丁汉读书。因此，在公众和业界，都有不少支持马来西亚的校友身居要职。作出在吉隆坡建立分校的决定后，只是完成了这场刚刚打响的战役的一半而已。实现海外分校还是一个有挑战性的难题。诺丁汉大学的方案被表述为“同一所大学，多样的分校”，这实际上意味着马来西亚分校（包括之后于2004年开办的中国分校），必须拥有一所大学的所有部分。

海外分校不能只是教育的前哨站。它们必须是功能相等的校园。对于大学来说操作层面上的挑战与运输相关，说得更确切些，学校要怎么才可以把诺丁汉大学的教育经验原汁原味地搬运到海外分校去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诺丁汉大学的国际分校从英国本部借调了资深学者前往指导，他们再与分校在当地招募的教职员工通力合作。

如何平衡保持标准与融入本地之间的关系，是在海外建立分校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个度如何把握呢？不同的分校间应该有多大程度的相同，与当地环境相一致的程度又该有多少呢？这关系到两方面的原因。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只有当学生认为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质量与学校本部的相当时，一所大学的国际分校才算是真正的成功了。从道德上来说，提供教育的机构应当确保其教育无论从质量和标准来说都是对等的。但是，如果海外分校忽视了融入当地法律和文化语境的话，分校也可能走上歧路。校园生活的社会性以及教育项目的市场性都要求海外分校应当与其所在的国家相适应。

知易行难。跨国的常规教员访问、频繁的会议以及委员会架构等做法致力于解决上述问题。在管理流程方面，分校也需要在来自总部的策略方向以及适度的当地自主运作之间保持平衡。

（作者系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副校长、教务长，本报记者韩琨编译）

高教观点

南科大改革试验的停滞与重生

■刘广明

南方科技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试验田，但伴随着深圳公安局原局长李铭接替朱清时担任南科大党委书记，我们不得不说朱清时校长的治校理想：“去行政化”“教授治校”“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等就此停滞。

“回头看”南科大五年的改革，我们就会发现，朱清时的梦想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一个不牢固基础上的。他们所有的改革，实际上都是一种“闯红灯”或者是“抢黄灯”行动，基本没有法律基础，只是建立在朱清时的个人权威之上。笔者曾断言，后朱清时时代这些改革将难以为继。如其“去行政化”，在实现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基础上、在其主要成员由官员组成的理事会决策下，南科大怎么可能“去行政化”？其“教授治校”，因朱清时改革依靠的主要人员是其在中国科技大学的“老部下”，教授们基本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甚至出现教授顾问班底集体“反水”的情况。虽其自主招生勉强说得过去，但也是建立在高考基础之上的。“自授学位”早已注定失败。

全面模仿香港科技大学的改革，在中国为什么就没有结出硕果呢？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南科大的举措不符合当下国情。任何组织都不是自给自足的，一个组织只有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组织自身才能取得可持续发展；如果与外部环境格格不入，就无法取得外部环境的支持，这样的组织注定要失败。南科大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南科大的改革与中国当下大学的治理模式南辕北辙，从根上说就不会取得教育部和省政府的支持。虽然南科大也曾取得一些教育部和省政府的“特殊照顾”，如特批为“大学”，但从根上讲，它不符合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要求。南科大“被改革”只是早晚的事。

改革停滞后的南科大如何重生呢？我认为，南科大今后的改革应该从中国大学治理模式上下功夫。具体来讲，南科大首要的是，接受中国大学治理模式这一中国特色的大学发展道路，对这种模式要有基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是前提，也是改革的基础。我相信李铭主导下的南科大会认真贯彻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基本信条。其次，要认真分析南科大五年改革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和经验、教训，科学探索教授治校的途径与举措。不要争论“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的对与错、优与劣，而是要科学、合理地处理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给行政权力设置合理的边界，同时要让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在阳光下运作，真正形成让教授安心治学的环境，形成行政权力服务学校学术事务的文化氛围。第三，全心全意依靠教师和学生，把教师当成办大学的基础，把学生当成办大学的根本，充分尊重师生的权力、权益，围绕学生成长办大学，依靠教师办大学。第四，在顶层设计的基础上，要建立相应的机构与平台、科学的制度与机制，从而使大学形成良性循环，不受或少受上层领导变化的影响。

（作者系河南工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